

# 美媒对华报道态度因何而起?

——以《纽约时报》为例

史晋川 江力涵 罗德明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要]** 美国媒体对华报道中出现的倾向性态度一直是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基于媒体国际新闻报道态度模型, 记者对报道态度的选择主要取决于社会对负面新闻的接受程度和新闻的重要程度。仅当社会对负面报道的接受程度较高时, 媒体内部报道态度才会出现差异, 即关联度较高的记者会倾向于负面报道, 关联度较低的记者则倾向于正面报道。基于《纽约时报》对华新闻报道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 《纽约时报》记者比非《纽约时报》记者负面报道倾向性更高, 新闻工作者相较自由记者更倾向于负面报道, 这表明美国媒体对中国新闻的负面报道现象源于美国民众对中国新闻存在先验偏见。

**[关键词]** 报道态度; 记者关联度; 《纽约时报》; 负面报道倾向; 中国新闻; 先验偏见

##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 但在外媒尤其是美国媒体的报道中, 中国的国家形象似乎一直都比较单一和固化。美国媒体一方面判定中国是一个缺乏其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 另一方面大肆渲染中国不断参与国际事务的“野心”<sup>①</sup>。而随着中美经济社会交流的深入, 这种对中国新闻的负面报道甚至被广泛运用到美国的政治选举中<sup>[1]17-18</sup>。2014年, 李克强总理在会晤美国新闻集团总裁汤姆森时提到, “希望国际媒体全面、客观报道中国”<sup>②</sup>, 这也意味着正确理解国际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报道态度及其背后的原因很有必要。

新闻报道具有“黑箱性”, 这使得新闻的创作过程往往无法被研究者直接观察到。已有关于美国媒体对华报道态度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传播学领域, 运用的方法主要基于传播学的经典理论, 少

[收稿日期] 2018-09-12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9-04-23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 33-6000/C

[基金项目] 国家“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选题项目(501902-F2160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NSFC-RCUK-ESRC 中英合作重大项目(7166113700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项目(16JJD790052);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大数据、机器学习与新计量经济学及其应用研究”

[作者简介] 1. 史晋川(<https://orcid.org/0000-0002-0265-3211>), 男,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经济学博士, 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等研究; 2. 江力涵(<https://orcid.org/0000-0003-1661-8430>), 男,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媒体经济学研究; 3. 罗德明(<https://orcid.org/0000-0002-7973-9451>), 男,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经济学博士, 主要从事金融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研究。

① 参见李梦悦《美国主流媒体 2011 年涉华报道框架研究》,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系 2012 年硕士学位论文, 第 8 页。

② 参见佚名《李克强会见美国新闻集团总裁汤姆森》, 2014 年 4 月 17 日,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4-04/17/content\\_2661687.htm](http://www.gov.cn/guowuyuan/2014-04/17/content_2661687.htm), 2018 年 9 月 12 日。

有学者从经济学角度对该问题进行研究。但随着 Gentzkow 和 Shapiro 对媒体报道偏差的相关定义和研究框架的完善<sup>[2]2</sup>，从媒体经济学角度来分析美媒对华报道问题可以为这一领域的发展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同时，本文借助可观察的媒体报道态度数据为不可观察的媒体负面报道倾向的存在提供理论和经验证据，从而探明影响对华报道态度的原因，这种研究方法也可以进一步丰富媒体偏差领域的相关文献。

首先，本文构建了国际新闻报道态度模型，研究媒体内部的报道态度选择机制。笔者发现，当社会对负面报道的接受程度较高时，媒体内部会出现报道态度差异。随后，本文基于《纽约时报》2010—2016 年对华报道新闻数据，构建媒体态度指数并展开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关联度高的新闻工作者倾向于负面报道，而关联度低的自由记者倾向于正面报道。这与理论模型的结论相符，也进一步说明，美媒对华报道态度来源于民众对中国存在的先验偏见。最后，本文利用其他衡量美媒对华报道态度的方法代替本文构建的媒体态度指数，并在控制了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后仍发现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包含两方面的研究。一是关注媒体报道态度的影响因素。学者认为，影响媒体报道态度的因素可以从需求视角和供给视角来进行分析。需求视角主要是指由于消费者信念有偏且倾向于接受与自己信念一致的媒体报道，媒体会通过选择报道态度来迎合消费者<sup>[3]</sup>。这种在报道态度上的迎合，既是因为公众往往忽略那些与自己观念不符的信息<sup>[4]</sup>，又是因为偏离读者的先验信念会给媒体带来声誉上的惩罚<sup>[2]</sup>。供给视角主要是指媒体报道态度会受到媒体所有者、记者和编辑的个人意志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政府能够通过所有权和行政权对媒体报道施加影响，这种影响不但有可能来源于政府本身，也有可能是由于政府为了维护某些利益集团<sup>[5]</sup>。另一些学者则研究广告投放和企业对媒体报道态度的影响<sup>[6-7]</sup>。关注新闻制作者对媒体态度的影响的文献以理论模型为主，鲜有研究提供经验证据。Dyck 和 Zingales 认为，记者会为了取悦信息来源者而对其进行正面报道<sup>[8]4-6</sup>。在 Baron 构建的模型中，记者不但可以获得工资收入，还能获得出镜、出名等非物质回报<sup>[9]5-6</sup>。Gentzkow 和 Shapiro 虽然利用数据发现记者和编辑本身的认知对新闻报道没有显著影响，但不能排除在相关利益特别强的新闻领域中存在报道偏差的可能<sup>[10]40-42</sup>。

二是主要关注外媒对华报道态度的判断和识别。这些文献大多认可在报道中国新闻时，媒体存在负面报道倾向，但其论证大多依赖人工判断，缺乏对媒体报道态度分类标准的准确性的论证。Wu 运用框架分析法对比中国新华社和美国美联社关于中国疾病的新闻报道，发现美联社更倾向于构建反对政府的报道框架<sup>[11]</sup>。史安斌和周庆安对中共十六大召开前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主题、新闻源和关键词等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以此来判断美媒在报道中国新闻中存在的偏见和曲解<sup>[12]</sup>。赵泓根据人为判断将《每日电讯报》中对中国的新闻报道分为正面报道、负面报道和中性报道，发现负面报道的数量逐年下降，但仍显著多于正面报道<sup>[13]</sup>。也有文献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美国媒体对华报道态度，如 Ramirez 和 Rong 对美国媒体抨击中国的新闻进行了归纳，认为负面新闻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并通过计算负面新闻出现的频率，发现贸易赤字会在短期内提高负面新闻出现的频率<sup>[14]</sup>；Lu 等构建了美国新闻对华负面报道的语料库，发现进口中国商品更多的地区的民众更容易读到对华负面新闻，但这组语料库在构建中缺乏合理的理论支撑，我们将对该指标进行改进<sup>[1]13-15</sup>。本研究首次通过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式研究美国媒体对华报道态度。本文从中国的视角出发，提供了一个美国媒体乃至西方媒体报道中国时选择报道态度的新闻框架，通过这个框架可以发现，影响媒体报道态度的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存在交互效应。

## 二、国际新闻报道态度模型

由于美国媒体对华报道态度偏差的产生机制与一般性的媒体报道偏差类似,本文采用标准化的垄断媒体模型框架来构建媒体报道国际新闻的态度选择模型,同时将详细讨论模型假设在国际新闻报道市场中的合理性,以期更加准确地探究影响媒体报道态度的因素。

### (一) 模型设定

#### 1. 记者行为

假设真实新闻存在两种状态  $\omega \in \{G, B\}$ , 其中,  $G$  表示正面新闻,  $B$  表示负面新闻; 真实状态为负面新闻  $B$  的概率为  $\rho_0$ 。新闻存在信息不对称性, 在新闻报道时, 记者能够观察到真实事件的状态; 而读者无法直接观察到, 只能通过媒体报道获得新闻。假设媒体倾向于负面报道<sup>①</sup>。记者选取的报道策略是  $r \in \{g, b\}$ , 其中,  $g$  表示记者正面报道,  $b$  表示记者负面报道。当真实新闻为负面新闻时, 记者会全部负面报道, 也就是说, 其概率为  $Pr(r=b|\omega=B)=1$ ; 当真实新闻为正面新闻时, 记者将选择部分进行负面报道, 记者负面报道的概率为  $Pr(r=b|\omega=G)=q>0$ , 其中,  $q$  表示负面报道倾向, 如表 1 所示。

表 1 报道倾向矩阵

新闻真实状态 $\omega$	记者报道策略 $r$	
	正面报道 $g$	负面报道 $b$
正面新闻 $G$	$1-q$	$q$
负面新闻 $B$	0	1

假设记者的效用函数如下:

$$u(q) = \omega + \varphi(q)R \quad (1)$$

其中,  $\omega$  表示工资,  $\varphi(q)$  是读者接收到该记者报道负面新闻的概率, 亦即

$$\varphi(q) = Pr(r=b) = \rho_0 + (1-\rho_0)q \quad (2)$$

$R$  表示记者负面报道带来的未来回报率,  $\varphi(q)R$  表示负面报道带来的预期额外收益。记者为满足媒体需求, 提升自己的负面报道倾向, 同时获得更多的晋升和提高声誉的机会, 其效用也会增加。

假设记者存在外部市场。在外部市场中, 有同样能力成为记者的人既可以从事记者行业, 也可以从事非记者行业。外部市场上对应的均衡工资水平为  $\omega_0$ , 记者接受当前媒体提供的工作的前提是该工作带来的效用不低于外部市场的均衡工资水平, 亦即

$$\omega + \varphi(q)R \geq \omega_0 \quad (3)$$

媒体公司会雇佣两类与公司关联度(即记者身份)存在差异的记者  $\{h, l\}$ , 其中, 记者  $h$  是与媒体公司关联度较高的记者, 例如报纸的编辑和特派记者; 记者  $l$  是与媒体公司关联度较低的记者, 例如报纸雇佣的自由记者。这两类记者在报道的能力和报道选择的限制条件上是一致的, 记者的身份不是区分记者能力的标准。但由于身份的不同, 记者通过公司获得的额外收益存在差异。与媒体公司关联度高的记者能够比与媒体公司关联度低的记者获得更多的额外收益。这种额外收益

<sup>①</sup> 本文所假设的这种负面报道倾向并不是由于迎合读者偏好或吸引读者眼球, 而是与媒体公司的所有制或媒体一贯的风格有关, 比如《纽约时报》因其严肃的报道风格被称为“灰色女士”。一定程度的负面报道可能代表着一种批判性的新闻报道风格, 是媒体的一种标签。

包括媒体公司提供的获得关注、接受采访、升迁等机会，这取决于媒体发展水平以及公司的文化和氛围。因此，我们假设相较于记者  $l$ ，记者  $h$  可以获得更高的未来回报率，即  $R_h > R_l$ 。为了防止新闻过度失真，媒体要求记者  $h$  和记者  $l$  的负面报道倾向上限分别不能超过  $\bar{q}_h$  和  $\bar{q}_l$ ，其中， $\bar{q}_h, \bar{q}_l \in [\underline{q}, \bar{q}]$  且  $\bar{q}_h \geq \bar{q}_l$ ， $\underline{q}$  和  $\bar{q}$  分别表示社会可接受的最高和最低负面报道倾向<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可接受的最低和最高负面报道倾向 ( $\underline{q}, \bar{q}$ ) 取决于以下两方面。首先，是读者事后验证信息的可能性。读者事后通过其他渠道获取真实信息的可能性越小，那么读者就越容易接受当前新闻，社会对负面报道倾向的容忍度就越高。其次，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由于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渊源，美国民众与其他国家民众对同一事物的理解往往具有本质差异，这同样会导致其社会可接受的负面报道倾向较高。为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新闻和记者的总量都为 1，其中记者  $h$  的比例为  $\theta$ ， $\theta$  是外生给定的<sup>②</sup>。那么对读者而言，若已知两类记者的负面报道倾向，这份报纸的负面报道新闻概率为：

$$\varphi(q_h, q_l) = \theta\varphi(q_h) + (1-\theta)\varphi(q_l) = \rho_0 + (1-\rho_0)[\theta q_h + (1-\theta)q_l] \quad (4)$$

## 2. 读者与媒体公司的效用函数

假设读者的阅读偏好  $x$  在  $[-1, 1]$  上服从均匀分布，其中正面态度为  $-1$  (极左)，负面态度为  $1$  (极右)。读者不需要为阅读报纸付出成本，同时读者并不认为自己的观点存在偏见，报纸报道态度的偏移会降低读者的效用，当且仅当阅读报纸带来的效用不低于零，读者才会阅读报纸。

不失一般性，读者  $x$  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u = 1 - \beta |x - [\varphi(q_h, q_l) + (-1) \times (1 - \varphi(q_h, q_l))]| = 1 - \beta |x - (2\varphi(q_h, q_l) - 1)| \quad (5)$$

其中， $\beta$  表示读者对新闻观点的反应强度， $2\varphi(q_h, q_l) - 1$  表示报纸整体报道态度<sup>③</sup>。

媒体公司的效用函数一方面来源于经济收益，另一方面来源于新闻对媒体的重要性。假定媒体偏好负面报道，即  $1$ ，媒体公司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F(q_h, q_l) = AD(q_h, q_l) - \theta\omega(q_h) - (1-\theta)\omega(q_l) - m(1 - \varphi(q_h, q_l)) \quad (6)$$

其中， $A$  表示单位阅读量的广告收入，模型中广告的收入取决于读者的数量， $A$  的大小取决于媒体的发展水平和对应广告商的收入水平，是外生的。 $D(q_h, q_l)$  表示阅读报纸的读者数量， $\omega(q_h)$ 、 $\omega(q_l)$  表示两类记者的工资， $m$  表示新闻的重要性。 $m$  越大，媒体越关注该新闻的报道态度；反之，媒体越关注其经济收益。 $m$  的大小与新闻类别相关，社会、政治、经济等发挥“看门狗”职能的新闻重要性较高，而其他如体育、艺术新闻的重要性较低。另一方面，媒体也更容易在社会、政治类新闻中体现其负面报道的偏好，社会、政治类新闻需要发表观点，相较体育、艺术类新闻更容易模糊事物的客观性。

本文理论模型中博弈的顺序为：(1) 自然选择负面事件的发生率；(2) 媒体公司确定每类记者的负面报道倾向上限；(3) 记者选择最优的负面报道倾向；(4) 读者根据报纸的报道态度和自己的阅读偏好做出是否阅读报纸的选择。

① 这种对记者负面报道倾向的限定可以理解为媒体与记者之间的约定或者编辑部门对记者报道内容的把关，与媒体公司有紧密联系的记者更有可能按照媒体的要求进行报道。给关联度高的记者更宽松的报道空间，能够在保证媒体不损失声誉的情况下满足媒体本身的负面报道偏好。

②  $\theta$  在现实中可以代表媒体对不同身份记者的雇佣比例；也可以表示在选择发表内容上，媒体对不同身份记者的报道采纳的比例。这取决于媒体自身的习惯和经验，比如报纸上专栏作家的篇幅是相对固定的。

③ 在文中， $\beta$  足够大，能够保证记者是针对目标受众进行报道；当  $\beta$  较小时，会出现一篇报道既满足大部分偏左读者的偏好，又满足大部分偏右读者的偏好，这不符合实际。参见 Stone D., "Ideological Media Bia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 78, No. 3 (2011), pp. 256 - 271.

## (二) 模型的讨论

我们从以下三方面讨论上述模型设置的合理性。

### 1. 垄断模型

传统西方媒体经济学在研究媒体报道时,通常假设新闻市场是寡头垄断市场或垄断竞争市场,报道态度依附于政治立场,媒体之间相互博弈的竞争策略导致媒体市场中存在报道态度的多样性。这使多种声音、态度可能存在于媒体报道市场,既满足政治博弈的需求,又满足读者对报道多样性的需求。

本文研究的美国新闻媒体报道,不是考察政党竞争和媒体政治立场等传统西方媒体经济学关注的问题,而是考察美国媒体报道国际新闻的机理。不同于国内新闻报道,国际新闻报道与媒体“看门狗”的职能关联并不紧密,也不是媒体竞争的主要新闻领域。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过程中,媒体更关注意识形态差异和价值观导向,很少受到政党竞争和媒体政治立场的影响,媒体市场更接近于垄断模型。另一方面,深入提供国际新闻报道存在较高的门槛,在美国只有那些具有较大规模和较高影响力的少数精英媒体能够承担,这些媒体的新闻观点更独立<sup>[15]</sup>。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读者有时间和精力阅读多种媒体,这弱化了媒体间的直接竞争,使媒体在报道市场中更类似于垄断者。

### 2. 国际新闻报道的意识形态差异

国际新闻报道更加关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差异,导致媒体进行负面报道反而更符合社会和读者对新闻的要求。美国学者 Malek 和 Kavoori 认为,对国际新闻的理解主要突出国际新闻中的文化认知和价值层面,这意味着媒体对有冲突意识形态的国家进行报道时往往会采取苛刻的言辞甚至将其妖魔化<sup>[16]</sup>。靖鸣和袁志红也认为传播媒介目标是话语之争,实质是体制之争,西方国家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国家利益进行报道,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信息入侵和文化暴力<sup>[17]49</sup>。本文在模型设置中引入  $\underline{q}$  和  $\bar{q}$ , 用来表示在意识形态差异下社会和读者可接受的负面报道倾向的区间。

### 3. 国际新闻报道的异质性

本文通过在垄断模型框架中引入不同类型记者这一媒体组织结构来考察媒体内部报道态度差异性的问题。传统西方媒体经济学假设新闻报道采用单一化的报道态度,这是因为在美国的两党政治体制下,媒体能够通过彰显单一化的政治立场来迎合读者的政治新闻需求,从而实现收益最大化;而在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国际新闻报道中,单一化的报道立场并不一定是满足异质性读者阅读偏好最有效的报道策略。因此,本文在模型中引入具有不同激励机制的记者来内生报道选择,这种模型的设置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媒体内部是否会存在报道态度的差异,以及在何种情形下媒体内部会出现报道态度的差异。

## (三) 模型结论

下面将通过逆向推理来求解上述模型。首先考察读者的效用函数。给定记者的负面报道策略  $q_h$  和  $q_l$ , 且满足  $\beta$  足够大, 可得阅读报纸的读者范围为:

$$2\varphi(q_h, q_l) - 1 - \frac{1}{\beta} \leq x \leq \min\left\{1, 2\varphi(q_h, q_l) - 1 + \frac{1}{\beta}\right\} \quad (7)$$

当报纸整体报道态度  $2\varphi(q_h, q_l) - 1 > 1 - \frac{1}{\beta}$  成立时, 所有偏右的读者都可以从阅读中获得正效用。从式(7)中可以推导出读者的数量为:

$$D(q_h, q_l) = \begin{cases} 2 + \frac{1}{\beta} - 2\varphi(q_h, q_l) & 2\varphi(q_h, q_l) - 1 > 1 - \frac{1}{\beta}, \\ \frac{2}{\beta} & 2\varphi(q_h, q_l) - 1 \leq 1 - \frac{1}{\beta} \end{cases} \quad (8)$$

式(8)表明当  $2\varphi(q_h, q_l) - 1 \leq 1 - \frac{1}{\beta}$  成立时, 购买报纸的读者数量不受报道态度的影响; 反之, 报纸的负面报道越多, 读者的数量就会越少。

接下来, 我们考虑记者的最优选择。通过式(1)不难发现, 当选择最高的负面报道倾向时, 记者能实现最高的效用水平。因此, 结合公式(3), 均衡状态下记者的工资水平为:

$$\begin{aligned} w(\bar{q}_h) &= w_0 - \varphi(\bar{q}_h)R_h \\ w(\bar{q}_l) &= w_0 - \varphi(\bar{q}_l)R_l \end{aligned}$$

媒体公司的最优化问题可以表示为:

$$F(\bar{q}_h, \bar{q}_l) = AD(\bar{q}_h, \bar{q}_l) - \theta w(\bar{q}_h) - (1 - \theta)w(\bar{q}_l) - m[1 - \varphi(\bar{q}_h, \bar{q}_l)] \quad (9)$$

通过对式(9)求导, 媒体公司的最优负面报道倾向选择可以归纳为以下命题。

命题 1: 当满足  $2\varphi(q) - 1 > 1 - \frac{1}{\beta}$  时, 若  $m > 2A - R_l$ , 媒体选择  $\bar{q}_l = \bar{q}_h = \bar{q}$ ; 若  $2A - R_h < m < 2A - R_l$ , 媒体选择  $\bar{q}_h = \bar{q}, \bar{q}_l = q$ ; 若  $m < 2A - R_h$ , 媒体选择  $\bar{q}_l = \bar{q}_h = q$ 。

命题 2: 当满足  $2\varphi(\bar{q}, q) - 1 > 1 - \frac{1}{\beta} \geq 2\varphi(q) - 1$  时, 若  $m > 2A - R_l$ , 媒体选择  $\bar{q}_l = \bar{q}_h = \bar{q}$ ; 若  $2A - R_h < m < 2A - R_l$ , 媒体选择  $\bar{q}_h = \bar{q}, \bar{q}_l = q$ ; 若  $m < 2A - R_h$ , 媒体选择  $\bar{q}_l = q, \bar{q}_h = \frac{2\beta(1 - q + \theta q)(1 - \rho_0) - 1}{2\beta(1 - \theta)(1 - \rho_0)}$ 。

命题 3: 当满足  $2\varphi(\bar{q}) - 1 > 1 - \frac{1}{\beta} \geq 2\varphi(\bar{q}, q) - 1$  时, 若  $m > 2A - R_l$ , 媒体选择  $\bar{q}_l = \bar{q}_h = \bar{q}$ ; 若  $m < 2A - R_l$ , 媒体选择  $\bar{q}_h = \bar{q}, \bar{q}_l = \frac{2\beta(1 - \theta \bar{q})(1 - \rho_0) - 1}{2\beta(1 - \theta)(1 - \rho_0)}$ 。

命题 4: 当满足  $2\varphi(\bar{q}) - 1 \leq 1 - \frac{1}{\beta}$ , 媒体选择  $\bar{q}_l = \bar{q}_h = \bar{q}$ 。

以上命题表示在不同的社会可接受的负面报道倾向下, 媒体根据新闻的重要性程度做出的报道选择, 详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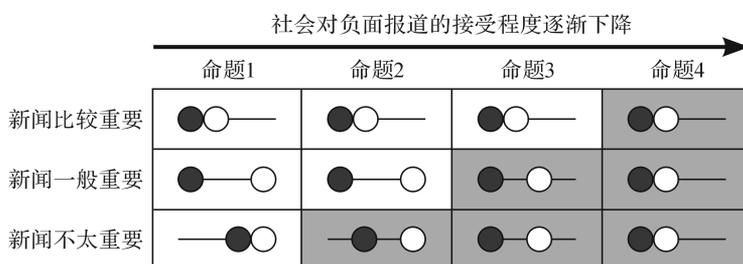


图 1 媒体的最优选择<sup>①</sup>

根据图 1 可以发现: 当社会对负面报道的接受程度较低时, 媒体内部会采取一致性的报道态度; 而当社会对负面报道的接受程度较高时, 媒体内部才会出现差异性的报道选择。同时, 新闻的重要性也会影响媒体的报道选择: 当社会可接受的负面报道倾向较高时, 内部报道差异会出现在一般重要和不太重要的新闻当中; 若进一步提高可接受的负面报道倾向, 那么内部报道差异仅会出现在一般重要的新闻报道中。现实中, 我们无法观察到社会对新闻报道态度的需求, 也观察不到媒体公司和记者对报道态度的要求。但是, 根据本文的理论模型, 我们可以从媒体内部报道态度即不同关

<sup>①</sup> 黑球表示记者 h 的负面报道倾向, 白球表示记者 l 的负面报道倾向, 球在最左端表示负面报道倾向为  $\bar{q}$ , 球在最右端表示负面报道倾向为  $q$ 。灰色背景表示媒体的负面报道态度会影响读者的数量, 而白色背景表示读者的数量不受影响。

联度记者的新闻报道态度的差异性表现,来反推影响媒体报道态度的真实原因。下文将通过构建媒体报道态度指数实证检验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新闻时的态度选择,并解释其背后的原因。

### 三、数据描述与统计

根据理论模型的结论,本文利用 ProQuest 数据库收录的《纽约时报》(以下简称《时报》)2010—2016 年间报道的中国新闻,来检验关联度有差异的记者是否在报道中国问题时具有不同的负面报道态度。由于 2007 年、2008 年 IOS 系统和安卓系统逐渐占领手机市场,智能手机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倒逼传统新闻媒体改变报道模式,使新闻呈现出更加碎片化、更加博人眼球的特点。因此,本文选取 2010 年至 2016 年智能手机进入市场后媒体表现相对稳定的周期作为研究周期,另外,较短的研究周期能够保证关键词的有效性。本文选择《时报》作为研究对象是为了保证理论模型中垄断假设的合理性。学者普遍认为《时报》在美国有着非常突出的影响力,不但能影响到美国民众,更是美国政客的普遍读物<sup>①</sup>。作为美国新闻界的龙头老大,《时报》的观点更加独立,其报道态度更少依赖或顾虑其他媒体的报道内容和倾向。由于以“China”等作为关键词的干扰文章过多,在对文章进行选取时,以文章报道地点(location)中包含“China”作为选取标准。本文利用 Probit 模型进行识别回归:

$$\Pr(\text{Index} = 1) = \alpha_0 + \beta \text{Reporter} + \sum \alpha_i x_i$$

模型中,Index 表示每篇文章的态度指数;Reporter 表示记者的身份变量,代表记者与媒体公司的关联度; $x_i$  代表可能影响到态度变化的控制变量。

#### (一) 媒体报道态度指数

本文构建的媒体报道态度指数是指文章中对国家行为、观点采取某种态度和评价,引导读者对该国整体形象做出判断的一种指数。《时报》在报道有关中国的新闻时,往往并不使用情绪强烈的词汇,刘恩东也认为“《时报》通过使用特定词汇、隐喻、间接引用、偷换概念、隐性评价、名物化等语言技巧传达意识形态信息……如《时报》在新闻报道中常使用‘共产党政权’、‘社会主义国家’等词”,这些词虽然不带有情绪,却具有鲜明的立场,会强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感<sup>[18]</sup>。本文认为,报道过程中传递的观点和态度不但来源于词汇的“巧妙使用”,还来源于报道角度的选择。因此,本文在选择关键词时,将关键词分为两类,一类为代表中国态度、观点和行为的词,如“Communist Party”“Xinhua”“CCTV”等;另一类为国内外存在明显争议的新闻视角,如“human rights”“corruption”“dumping”等,当这些关键词被反复提及,新闻更有可能倾向于负面报道。参考游家兴和吴静<sup>[19]</sup><sup>[145]</sup>的研究,本文认为当关键词出现次数大于等于 3 次时,Index=1,表明该新闻报道为负面报道,其他情况下 Index=0。接下来,本文将检验该指数的准确性。

本文随机抽取部分新闻报道作为训练集进行检验,人工识别每篇新闻的报道态度并进行分类,将识别后的结果与媒体报道态度指数进行比对。《时报》在对中国进行新闻报道时存在尖锐态度的主要表现为:在对外贸易上强调政府操纵人民币和价格倾销;模糊东海、南海的归属权,强调争议;强化中国好战、有称霸世界的野心的形象;在描述中国处理西藏、新疆问题时,强化矛盾和人权问题;报道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等人权问题和产品质量等社会责任缺失问题;报道中国对西方媒体的态度时,认为西方媒体报道有意妖魔化中国等。当出现上述新闻的直接表述时,认为该报道的态度

<sup>①</sup> 参见范晓玲《〈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国际新闻报道比较研究》,暨南大学新闻系 2014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2 页。

为1,其余为0。训练集的人工识别与构建的媒体报道态度指数的比对结果对报道态度指数的准确性有重大影响。为了保证人工识别分类的客观性和正确性,我们从全体样本中随机抽选304篇新闻报道,邀请多位研究生进行人工识别。先由两位研究生独立进行分类,如果结果出现差异,再邀请第三位研究生独立做出分类,最后取三人的众数作为结果。相关结果参见表2。

表2 人工识别与媒体报道态度指数对比

类别	人工识别比例	媒体报道态度指数	
		1	0
人工识别	1	41.12%	<b>108</b> 篇
	0	58.89%	40篇
训练集识别比例		48.68%	51.32%
全样本识别比例		45.79%	54.21%

在表2中,人工识别的1、0类新闻报道分别占41.12%、58.89%,与训练集识别后的48.68%、51.32%和全样本识别后的45.79%、54.21%相近。人工识别分类与所构建的媒体报道态度指数比对的正确分类率达到86.84%,表明该指数有较高的代表性和准确性。

## (二) 记者关联度识别

样本总体包含6217篇新闻,其中5847篇新闻收录了新闻作者的姓名。存在多名新闻记者的情况下,本文取第一作者信息进行整理,总共整理出有效记者847名。通过领英、《时报》官网、个人主页等渠道获取记者身份信息,本文识别出573名《时报》记者,其所报道的新闻占总报道量的86.36%。其他非《时报》记者主要包括其他报纸记者、作家、其他行业的名人和专家等。本文的关键是根据记者身份信息识别记者与媒体的关联度。针对该573名《时报》记者,通过记者的自我介绍和官方介绍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关联度较高的新闻工作者,主要包括编辑、采访记者、摄影记者,这些记者的工作范畴与新闻采编直接相关,占总体的74.3%;第二类是关联度较低的自由记者,占总体的9.4%;第三类是除上述记者以外的其他记者,主要包括专栏作家和评论记者,占总体的16.3%。由于第三类记者的关联度较难判断,本文主要关注前两类记者身份的识别结果。

## (三) 控制变量

除了每篇报道的新闻内容和记者信息,笔者还收录了每篇报道的新闻来源、新闻体裁、新闻板块、新闻版面和报道时间。新闻来源为新闻开头提供的新闻发生地点信息,这些信息来源主要区分为中国大陆(内地)、中国港澳、中国台湾和非中国地区。新闻体裁包括新闻(news)、时评(commentary)、社论(editorial)、专题文章(feature)和其他,本文控制的前四种类型占总样本的95.2%。新闻板块上,笔者选取数量超过总样本的2%的分类,包括国际新闻(foreign desk)、商业(business/finance desk)、专栏(op-ed)、社论(editorial)、体育(sport desk)、艺术(arts desk)、国内新闻(national desk)和概要(brief)。由于两种分类标准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本文将在回归分析中对新闻板块和新闻体裁分别控制。新闻版面中,A为要闻,B为大都会新闻,C为经济生活,这三版占总样本的89.2%。同时,本文关注读者对新闻报道的影响,将股市休市的日期作为美国民众的休息日。另外,本文控制政治环境变化、《时报》CEO的更替、《时报》每日的发文量以及当日的股价。

##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本节将通过实证方法检验记者关联度对中国新闻报道态度的影响。

### (一) 记者关联度与报道态度

首先,本文关注《时报》记者(NYTreporter)与非《时报》记者在报道态度上的差异,见表 3。模型(1)中没有加入任何控制变量,模型(2)中加入记者报道的环境变量,包括媒体报道可能存在的时间趋势(Year)、《时报》当天的新闻报道量(Newspaper)、CEO 的更替(CEO)、是否为休息日(Holiday)、《时报》当日的股价(ln price)。大量文献认为政治环境对媒体报道存在影响,本文加入中国国家领导人更替的控制变量(China)<sup>①</sup>。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新闻的所属版面变量。模型(4)在此基础上加入新闻信息的来源。模型(5)和模型(6)分别控制了新闻的不同分类标准:新闻板块和新闻体裁。观察模型(1)到模型(6)发现,《时报》记者相较非《时报》记者更倾向于负面报道,这个结果在 1%的水平上显著。而且,加入了所有的控制变量,《时报》记者仍然比非《时报》记者高出约 30%的可能性进行负面报道。

表 3 《时报》记者与非《时报》记者的报道态度差异

变量	(1)	(2)	(3)	(4)	(5)	(6)
NYTreporter	0.617*** (0.0494)	0.621*** (0.0497)	0.573*** (0.0531)	0.303*** (0.0552)	0.298*** (0.0686)	0.315*** (0.0670)
Year		-0.0368** (0.0152)	-0.0178 (0.0163)	-0.0220 (0.0168)	-0.0238 (0.0171)	-0.0226 (0.0169)
Newspaper		-0.140** (0.0642)	-0.0990 (0.0720)	-0.0787 (0.0740)	-0.104 (0.0749)	-0.0732 (0.0741)
CEO		0.232*** (0.0878)	0.105 (0.0924)	0.140 (0.0958)	0.178* (0.0968)	0.155 (0.0962)
Holiday		0.0892** (0.0369)	0.0695* (0.0400)	0.0642 (0.0411)	0.0648 (0.0415)	0.0643 (0.0412)
China		-0.0178 (0.0940)	0.0220 (0.0988)	-0.0261 (0.103)	-0.0490 (0.103)	-0.0337 (0.103)
ln price		-0.244** (0.0980)	-0.151 (0.104)	0.0125 (0.107)	-0.00628 (0.108)	0.00160 (0.107)
PageA			0.969*** (0.0643)	0.789*** (0.0663)	0.583*** (0.0746)	0.763*** (0.0679)
PageB			-0.196*** (0.0728)	-0.358*** (0.0762)	0.0243 (0.102)	-0.383*** (0.0778)

① 美国总统在 2010 年至 2016 年间未发生变化。

续表 3

变量	(1)	(2)	(3)	(4)	(5)	(6)
PageC			-0.210*	-0.208*	-0.210	-0.121
			(0.109)	(0.111)	(0.146)	(0.117)
信息来源	NO	NO	NO	YES	YES	YES
新闻体裁	NO	NO	NO	NO	NO	YES
新闻板块	NO	NO	NO	NO	YES	NO
<i>n</i>	6 217	6 217	6 217	6 217	6 217	6 217
Pseudo <i>R</i> <sup>2</sup>	0.019 1	0.021 9	0.146 4	0.199 1	0.212 8	0.200 0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考虑到是否属于《时报》记者可能并不是对关联度差异的有效分类，我们在接下来的回归中重点关注《时报》内部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和自由记者(Freelance)在报道态度上的差异，见表 4<sup>①</sup>。在表 4 中，模型(1)和模型(2)的解释变量为是否属于新闻工作者，模型(3)和模型(4)的解释变量为是否属于自由记者。可以发现，新闻工作者负面报道的概率要比其他记者高出 0.590 和 0.652。而自由记者负面报道的概率要比其他记者低 0.736 和 0.719，且所有结果在 1%的水平上显著。由此可见，新闻工作者和自由记者在负面报道倾向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也说明《时报》在报道中国问题时，不同的关联度会导致记者在新闻报道上存在态度差异，而根据理论模型的结论可知，美国民众倾向于阅读负面的中国新闻。

表 4 《时报》不同记者身份与报道态度差异

变量	(1)	(2)	(3)	(4)
Journalist	0.590***	0.652***		
	(0.098 1)	(0.098 9)		
Freelance			-0.736***	-0.719***
			(0.215)	(0.21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新闻体裁	NO	YES	NO	YES
新闻板块	YES	NO	YES	NO
<i>n</i>	5 355	5 356	5 355	5 356
Pseudo <i>R</i> <sup>2</sup>	0.210 5	0.200 3	0.207 1	0.195 7

## (二) 新闻重要性与报道态度

接下来，本文考察在不同新闻板块下，《时报》内部新闻工作者和自由记者在选择报道态度上是否存在差异，见表 5。在样本量大于 2%的八个新闻板块中，国内新闻、社论、体育新闻和概要类新闻存在自由记者类别上的数据缺失，无法进行直接比较，因此，本文重点展示经济新闻、专栏新闻、国际新闻和艺术新闻板块下的回归结果。一般认为，对报纸而言，经济新闻和专栏新闻的重要性往往较高，艺术新闻的重要性较低，而国际新闻的重要性往往处于中间状态。通过表 5 发现，在报道

① 我们无法有效区分《时报》自由记者与其他报纸的新闻工作者与《时报》关联度的差异。

经济新闻和专栏新闻时,《时报》内部新闻工作者相对倾向于负面报道,自由记者相对倾向于正面报道,但两者并没有显著的区别。而在报道国际新闻时,这种区别就非常明显,《时报》内部新闻工作者进行负面报道的概率比其他记者高出 81.1%,而自由记者进行负面报道的概率则比其他记者低 138.1%。在报道重要性较低的艺术新闻时,两类记者报道态度的差异也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别。上述结论与理论模型中的命题 1 一致,这表明美国社会对中国有较深的偏见,导致美国民众更愿意阅读负面的中国新闻。

表 5 新闻重要性与报道态度差异

新闻板块	新闻工作者	自由记者	样本数量
经济新闻	0.232 (0.186)	-0.189 (0.451)	1 533
专栏新闻	0.353 (0.359)	-0.197 (0.834)	81
国际新闻	0.811*** (0.314)	-1.381** (0.556)	2 670
艺术新闻	0.161 (0.435)	0.702 (1.120)	118

### (三) 稳健性检验

对实证结果的担忧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媒体报道态度指数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另一方面,回归结果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即不同的记者能够接触到的负面新闻的概率是不同的。接下来将主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考虑第一个方面的问题。Lu 等的研究通过程序自动筛选和人工识别相结合的方法,识别出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新闻时能够代表偏差含义的关键词<sup>[1]</sup>。本文将利用该识别方法来代替本文构建的媒体报道态度指数,回归结果见表 6。与表 4 一致,表 6 中,模型(1)和模型(2)的解释变量为是否属于新闻工作者,模型(3)和模型(4)的解释变量为是否属于自由记者。我们发现,虽然稳健性检验的结果相比媒体报道态度指数的回归系数较小,但仍然可以发现,关联度较高的新闻工作者要比关联度较低的自由记者有更明显的负面报道倾向,媒体内部存在报道态度差异。

表 6 媒体报道态度指数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Journalist	0.290*** (0.077 3)	0.393*** (0.080 0)		
Freelance			-0.368** (0.153)	-0.355** (0.15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新闻体裁	NO	YES	NO	YES
新闻板块	YES	NO	YES	NO
<i>n</i>	5 358	5 358	5 358	5 358
Pseudo <i>R</i> <sup>2</sup>	0.115 4	0.103 3	0.114 1	0.100 4

在解决遗漏变量问题时,我们主要参照 Ramirez 和 Rong 的研究结论<sup>[14]</sup>。他们认为美国抨击中国的新闻主要来自五个方面:“human rights”“Tibet”“child labor”“democracy”和“repression”,他们将包含这五个关键词的报道归为负面新闻。本文利用该方法构建负面新闻指数 Ramirez12,若包含上述关键词,Ramirez12 等于 1,否则等于 0。表 7 所有回归的被解释变量为 Ramirez12,从回归结果来看,记者身份确实对所接触到的负面新闻的概率有影响。对新闻工作者而言,他们接触到的负面新闻与其他记者接触到的负面新闻没有显著区别;而对自由记者而言,他们接触到负面新闻的概率要显著小于其他记者。

表 7 不同记者接触负面新闻的概率

变量	(1)	(2)	(3)	(4)
Journalist	0.0817 (0.0961)	0.123 (0.0971)		
Freelance			-0.563** (0.233)	-0.517** (0.23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新闻体裁	NO	YES	NO	YES
新闻板块	YES	NO	YES	NO
<i>n</i>	5358	5358	5358	5358
Pseudo <i>R</i> <sup>2</sup>	0.1034	0.0935	0.1044	0.0942

在表 8 中,我们观察这种负面新闻接触概率上的差异会不会影响记者的报道态度。其中,模型(1)–(4)的被解释变量为本文构建的媒体报道态度指数,模型(5)–(7)的被解释变量为 Lu 等对美媒报道偏差的识别方法<sup>[1]</sup>。所有模型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了 Ramirez12。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新闻本身的负面属性之后,不同关联度的记者仍然会影响到媒体的负面报道概率,媒体内部报道态度差异性的结论是稳健且显著的。另外,本文额外关注负面新闻对负面报道的影响,发现虽然不同记者接触负面新闻的概率存在差异,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记者,接触负面新闻都会显著提高其负面报道的概率。有意思的是,所有 Ramirez12 的回归系数都超过了 1,这意味着原本可能并不会进行负面报道的新闻因为触及人权、民主等问题,将有更大的可能被负面报道。

表 8 负面新闻对报道态度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5)	(6)	(7)	(8)
Journalist	0.602*** (0.102)	0.682*** (0.104)			0.275*** (0.0797)	0.366*** (0.0824)		
Freelance			-0.684*** (0.227)	-0.672*** (0.226)			-0.262* (0.157)	-0.261* (0.156)
Ramirez12	1.048*** (0.0524)	1.076*** (0.0522)	1.039*** (0.0522)	1.068*** (0.0519)	1.362*** (0.0802)	1.383*** (0.0797)	1.359*** (0.0801)	1.383*** (0.0796)
控制变量	YES							
新闻体裁	NO	YES	NO	YES	NO	YES	NO	YES

续表 8

变量	(1)	(2)	(3)	(4)	(5)	(6)	(7)	(8)
新闻板块	YES	NO	YES	NO	YES	NO	YES	NO
<i>n</i>	5 366	5 367	5 369	5 369	5 366	5 367	5 369	5 369
Pseudo $R^2$	0.269 0	0.262 9	0.265 3	0.258 0	0.181 1	0.172 6	0.179 7	0.170 0

## 五、结 论

本文尝试性地从可观察的记者报道态度和新闻重要性来理解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新闻时进行态度选择的“黑箱”。首先,本文通过构建媒体国际新闻报道态度模型,发现只有当社会对新闻的负面报道接受程度较高时,媒体内部才会出现报道态度的差异,即关联度较高的记者倾向于负面报道,而关联度较低的记者倾向于正面报道。随后,本文通过《时报》的对华报道新闻数据构建媒体报道态度指数并进行实证回归。结果表明,《时报》记者比非《时报》记者负面报道倾向性更高,新闻工作者比自由记者的负面报道倾向性更高。进一步分样本回归后发现,重要性较高的经济、专栏新闻和重要性较低的艺术新闻不存在报道态度的显著差异,但重要性程度一般的国际新闻却存在明显的报道态度差异,这些结论表明美媒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源于美国社会对中国新闻存在的先验偏见。本文尝试对《时报》报道对华新闻的框架进行解读,丰富已有关于媒体态度和媒体偏差的文献,一方面探究现今美国媒体对中国新闻的倾向性报道的背后原因,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帮助读者更加理性地看待国外媒体报道的内容,进而也能够影响国外媒体报道的客观性。

## [参 考 文 献]

- [1] Lu Y., Shao X. & Tao Z. G., "Exposure to Chinese Imports and Media Slant: Evidence from 147 US Local Newspapers over 1998 - 2012," <http://www.business.hku.hk/~ztao/research.htm>, 2019 - 01 - 07.
- [2] Gentzkow M. & Shapiro J. M., "Media Bias and Reput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4, No. 2 (2006), pp. 280 - 316.
- [3] 李培功:《媒体报道偏差的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4期,第145-152页。[Li Peigong,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Media Reporting Bias," *Economic Dynamics*, No. 4 (2013), pp. 145 - 152.]
- [4] Mullainathan S. & Shleifer A., "The Market for New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 No. 4 (2005), pp. 1031 - 1053.
- [5] Djankov S., McLiesh C. & Nenova et al., "Who Owns the Media?"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46, No. 2 (2003), pp. 341 - 382.
- [6] Dewenter R. & Heimeshoff U., "Media Bias and Advertising: Evidence from a German Car Magazine," *Review of Economics*, Vol. 65, No. 1 (2014), pp. 77 - 94.
- [7] 饶育蕾、谢倩倩、王建新:《媒体关联与新闻报道偏差——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管理评论》2016年第9期,第194-205页。[Rao Yulei, Xie Qianqian & Wang Jianxin, "Media Relevance and News Reporting Bia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Management Review*, No. 9 (2016), pp. 194 - 205.]
- [8] Dyck A. & Zingales L., "The Media and Asset Prices," [http://www.anderson.ucla.edu/faculty\\_pages/romain.wacziarg/mediapapers/DyckZingales.pdf](http://www.anderson.ucla.edu/faculty_pages/romain.wacziarg/mediapapers/DyckZingales.pdf), 2019 - 01 - 07.

- [9] Baron D., "Persistent Media Bia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90, No. 1-2 (2006), pp. 1-36.
- [10] Gentzkow M. & Shapiro J. M., "What Drives Media Slant? Evidence from U. S. Daily Newspapers," *Econometrica*, Vol. 78, No. 1 (2010), pp. 35-71.
- [11] Wu M., "Framing AIDS in Chin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S and Chinese Wire News Coverage of HIV/AIDS in China,"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16, No. 3 (2006), pp. 251-272.
- [12] 史安斌、周庆安:《新闻构架、符码与制造同意的艺术——美国媒体“十六大”报道综合分析》,《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2期,第12-16页。[Shi Anbin & Zhou Qing'an, "Framing, Coding and Consent Making in US Journalism: A Case Study of CPC's 16th Congress Coverage in the US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No. 2 (2003), pp. 12-16.]
- [13] 赵泓:《〈每日电讯报〉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基于2003—2013年对华报道的内容分析》,《新闻大学》2014年第4期,第35-43页。[Zhao Hong, "A Study of the Image of China in the *Daily Telegraph*: Based on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Reports on China from 2003 to 2013," *Journalism University*, No. 4 (2014), pp. 35-43.]
- [14] Ramirez C. D. & Rong R., "China Bashing: Does Trade Drive the 'Bad' News about China in the US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20, No. 2 (2012), pp. 350-363.
- [15] 陈红梅:《美国媒体是怎样报道国际新闻的?——对相关研究文献的回顾》,《新闻记者》2011年第12期,第20-24页。[Chen Hongmei, "How Does the American Media Report International News? A Review of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 *Journalist*, No. 12 (2011), pp. 20-24.]
- [16] Malek A. & Kavoori A. P., *The Global Dynamics of News: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News Coverage and News Agenda*, Westpor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0, pp. 2-7.
- [17] 靖鸣、袁志红:《西方媒体报道与中国形象塑造》,《环球观察》2007年第2期,第47-49页。[Jing Ming & Yuan Zhihong, "Western Media Reporting and Image-building of China," *Global Observation*, No. 2 (2007), pp. 47-49.]
- [18] 刘恩东:《冷战后〈纽约时报〉涉华政治类报道的意识形态倾向分析》,《当代世界》2015年第7期,第68-71页。[Liu Endong, "An Analysis of the Ideological Tendency of *New York Times*' China-related Political Reports after the Cold War," *Contemporary World*, No. 7 (2015), pp. 68-71.]
- [19] 游家兴、吴静:《沉默的螺旋:媒体情绪与资产误定价》,《经济研究》2012年第7期,第141-152页。[You Jiaying & Wu Jing, "The Spiral of Silence: Media Emotions and Mispricing of Assets,"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No. 7 (2012), pp. 141-152.]

## What Drives U. S. Media Slant on China?

### — Take the *New York Times* as an Example

Shi Jinchuan Jiang Lihan Luo Deming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Chinese news reported by American media outlets is famous of its biased and tendentious reporting strategy, which could be understood as the portraying of China and its policies in a rather negative or critical perspective. As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public information, media slant on Chinese news has ever been applied to American political elections due to recent works. However, based on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scholars still did not come to an agreement on the existence of attitude deviation on Chinese news and its causes. As the rapid rise of innovative economic methods, the research about media slant on China could be done in a perspective of media economics. On the other hand, previous works pay more attention to biased reporting selections in domestic news reports. Most of the models are construct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uopoly market where media outlets make their optimal choices with their

political endorse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news reports, which are barely examined by previous researches. Firstly, we construct a reporting-attitude model of international news, interpreting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attitude deviation selection. We consider the international news market as a monopoly model, as media's attitude strategies depend more on the ideology and values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countries. Therefore, special impacts could be used to explain the reason of media deviation, such as journalists' media relevance. The theoretical model reveals that the selections of journalists' reporting strategies mainly depend on the degree of social acceptance of negative news and the importance of reporting news. Interestingly, only when the social acceptability of negative reports is high will there be a deviation between kinds of reporters, that is, journalists with higher relevance tend to report negatively, while journalists with lower relevance tend to report positively. Subsequently,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New York Times*' news reports on China from 2010 to 2016, we build the Chinese news attitude index and test the accuracy of it with manual identification. Later, we use Probit model to prove the conclusion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imes journalist tends to report more negatively than non-Times journalists, and journalists tend to report more negatively than freelance journalists.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nclusion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 Meantime, the difference of reporting attitude only appear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news with general news importance, which also verifies our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se results not only accord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 but also show that the negative Chinese news produced by American media originates from the priori prejudice of American public. Finally, after replacing the attitude index and controlling the missing variables, we find that the empirical results still support our conclu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s framework of how to choose the reporting strategies when American media or other Western media report Chinese news. Through this framework, we observe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between supply factors and demand factors whose impact on media deviation are mixed. Our work not only supplements the theories about impacts on media deviation and media bias, but also enriches the literature of U. S. media slant against China with new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Furthermore, our work provides a new research method on designing media deviation or media bias index for more detailed conclusion proof. Previous work constructs indexes concerning media content without avoiding manual identification, which is easily questioned by indexes' accuracy and artificial cognition problem. We think highly of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index and the accuracy proof from other ways, which make our index provable and exercisable with further research process.

**Key words:** reporting attitude; journalist relevance; *New York Times*; negative reporting tendency; Chinese news; priori prejudice

